

五尺道的开通及其相关问题

段 渝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成都 610066)

摘要:五尺道是古代四川盆地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重要交通线之一,同时也是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交流往还的重要线路。但是,关于五尺道的开通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没有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考察,多据成说以为是在战国末或秦代由秦开凿,这其实是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五尺道开通年代的误解。仔细分析《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并参证近年西南地区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五尺道是先秦古蜀王国与西南夷交往的要道之一,早在商代就已由古蜀王国的“五丁力士”开凿,并不是始由秦在战国末或秦代凿通。

关键词:西南夷道;五尺道;开通时代;五丁力士;商代晚期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4-0156-07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从蜀郡成都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为“西南夷道”^①。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有关西南地区的记载可以看出,先秦秦汉时期的西南夷道分为东、中、西三条线路:西线是“灵关道”,或称为“零关道”、“牦牛道”(一作“旄牛道”),由蜀之成都通往云南;中线为“五尺道”,由蜀之成都通往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部;东线是“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南夷道”,由蜀之成都经贵州通往两广以至南海。西线灵关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初通,在商周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都一直发挥着中国西部民族与文化南来北往交流互动的通道作用,并充当着中国西南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国际交通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这方面的认识,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对于中线五尺道的开通时代,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是战国末叶秦时开凿,亦有认为秦始皇时开凿,很少异议。但是,历来对于五尺道开通年代的认识却难以经得起推敲,实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一 五尺道并非秦人开凿

五尺道从古代成都南下南安(今四川乐山),经犍道(今四川宜宾)、夜郎西境(今贵州威宁、云南昭通),直通南中之建宁(今云南曲靖),是古蜀以及中原地区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同时也是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交流往还的重要线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頰略通五尺道。”《索隐》谓:“栈道广五尺。”《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阨,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五尺道是战国末叶秦国开通的,也有学者认为是秦汉时开通的。笔者曾在1993年出版的《四川通史》第一册中简略论证说,蜀、滇五尺道,《史记》记为秦时官道,但早在殷末,杜宇即由此从昭通北上至蜀;春秋时代,蜀王开明氏“雄张僚、夔”^{[1]卷三,185},进一步开通了成都平原与川南、滇东北的交通;以后,“秦时常破,略通五尺道”^②,对自商周至战国时代已经存在的这条道路予以进一步整修;这意味着,五尺道并不开凿于秦,秦仅是对五尺道加以重修和整建^{[2]161,257}。葛剑雄先生在《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

收稿日期:2013-02-22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编号:10&ZD08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段渝(1953—),男,重庆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个问题》一文中亦认为五尺道的开凿不始于秦,认为秦法既然是“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却公然修建“五尺道”,而严峻的秦法是不可能容忍“五尺”之制存在的,从而否定五尺道始修造于秦^{[3]1-13}。从秦法而论,葛先生的质疑确有道理。

关于五尺道的命名问题,本文后面还要论说。这里首先对是否秦人开凿五尺道进行考察。细审文献,《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頰略通五尺道”句中所说的“略通”,并不是“开凿始通”的意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徼中”,《索隐》引张揖曰:“蒙,故鄱阳令,今为郎中,使行略取之。”《汉书·司马相如传下》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徼中”,师古注曰:“行取曰略。夜郎、徼中,皆西南夷也。徼音蒲北反。”如果“略通”是“开凿始通”的意思,那么为何秦时常頰已经“开凿始通”,汉时唐蒙又来“开凿始通”?可见,“略通”并非“开凿始通”之义,而是略取并使之保持畅通的意思。可以看出,《史记》和《汉书》先后使用“略通”一词,恰好说明了五尺道在秦“行略取之”之前已经存在的事实。至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此事为“秦时常破,略通五尺道”,则有着整修和修治之义,这与《史记》的记载其实并不矛盾,略取和整修往往是前后相接、一以贯通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秦时常頰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4]卷一一六}

但《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却是:

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5]卷九五}

对于“蜀故徼”,《史记》记为“开”,《汉书》记为“关”,究竟是开还是关呢?对此,历史文献的记载颇不一致^③。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五尺道的开通时代却具有关键性作用,需要认真考订。

所谓“蜀故徼”,即是西南夷诸族经由五尺道通往蜀地的途中所设置的关隘。这里的“开蜀故徼”,“开”为开通的意思。细审历史文献及其文意,我们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开蜀故徼”的“开”(古文

写作“開”)字,实乃“關”字之误。

《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段文字所说的秦时“诸此国颇置吏焉”,这里的“诸此国”是指位于古蜀国以西和以南的邛、笮、冉、駹以及丹、犁等古国,这些古国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还继续效忠于长期以来一直是“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的故蜀国^{④[6]卷三,115},而蜀国的反抗也一直没有停歇,直到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秦国才在蜀彻底地建立起郡县制度^[7],此后秦国才可能道通西南夷。《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这里所说“秦时”,是指秦昭王以后的时段,而所说“秦时尝通为郡县”,则表明从秦昭王至秦灭的时段内西南夷与蜀之间道路畅通的事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接下来继续说:“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由此可知,既然秦在这些地方开通了郡县,置有守吏,那么这些地方之间的道路和关隘必然就是开通而不是关闭的。至秦灭汉兴,这些地方的族群“皆弃此国”,即拒绝汉王朝的统治,那么这时“诸此国”与汉王朝之蜀郡间的通道就只可能是关闭的,而不是开通。而司马相如所说:“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意指在当前关闭的情况下应当恢复开通。这就确切说明,在邛、笮、冉、駹等西南夷请求内附之前,汉王朝与西南夷间的交通关隘是关闭而不是开通的。正是因为邛、笮、冉、駹等“诸此国”关闭了蜀与西南夷地区之间的通道,所以才会出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到南中做买卖的现象,以至产生西南夷诸族阻碍汉使十余批出使大月氏的结果。假若是“开蜀故徼”,那么巴蜀民就不会“窃出”西南夷地区,而汉武帝为打通与大月氏联系所派遣的十余批汉王使臣,也就不可能在西南夷道上遭遇到“其北方闭氏笮,南方闭嵩昆明”^{[4]卷一二三}那样的尴尬局面,受到西南夷的重重阻碍。“開”、“關”二字,古文形近,今本《史记·西南夷列传》所用的“開”字,显然是在传抄过程中因形近而导致的讹误,致使谬种流传,我们自然不能根据错讹的字义来领会史书所载历史。

据上所述,蜀与西南夷之间早有商道可通,这就是“蜀故徼”。而这个“蜀故徼”,在秦王朝“略通五尺道”以前的商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二 “五丁力士”与五尺道

五尺道之所以称为“五尺”,应与古蜀王国“数以五为纪”有关。史书虽未明言蜀人数以五为纪,但是

蜀人崇尚五这个数字,从王室祭祀制度、社会组织直到宗教信仰,都以五计数,却是斑斑可见,史不绝书。并且,古蜀的文物制度多以五为纪的情况,也为历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一致性,十分明确地反映了古蜀这一特有的制度。

古代蜀人的尚五宗教观念形成甚早,从目前的资料看,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年以前古蜀文明起源时代、今成都郫县三道堰古城遗址中部大型房屋内的五座卵石台基^[8],由此连续贯彻到商周、春秋战国各个时期,其遗风至汉魏之际犹可观瞻。在尚五观念的支配下,古蜀人发展出了一系列“数以五为纪”的文化丛:以五为朝代数的王朝盛衰史、以五为庙制的宗庙祭祀制度、以五为王制的青铜器组合、以五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以五计数的其他若干事物,都是以尚五观念为核心凝成的文化特质。由此可见,尚五观念已成为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文化模式和行为方式,规定并支配着蜀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例如,青铜器中的罍、无胡三角形援戈、柳叶形剑等,从商代连续发展到战国,表现出古蜀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自有其演进规律;然而青铜器的组合却以五为纪,而为巨制,为王制(从新都蜀王墓中可充分证实此点),并且同样从商代连续发展到战国,存而不改,则表明古蜀青铜文化组合方式是在蜀人尚五观念支配下产生的一种行为方式,它的发展受到了尚五观念的严重制约。又如,五丁制度作为古蜀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其具体由来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组织形式同样是在尚五观念支配下发展出来的社会行为方式。至于其他以五为纪的事物,也莫不受到尚五观念的支配和制约。^[9]

公元前316年蜀亡于秦以后,虽然古蜀文明物质文化形式的发展受到遏制,社会组织形式完全被秦予以改造,政治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革,但由于尚五观念极深地镌刻在蜀文化的精神实质当中,具有极广大的社会功能和极强劲的历史惯性,所以秦蜀守李冰为了稳定其统治秩序,不得不利用尚五观念来作为工具,因势利导,以期引起广大蜀人的共鸣。李冰在兴修都江堰时,之所以“作石犀五头以厌(压)水精”^[1]卷三,202,正在于他准确地抓住了古蜀文化的宗教观念,准确地抓住了古蜀文化的精神实质,因而他就牢牢把握住了治蜀的精神武器,终于成功地修建了都江堰,创造出历史的奇迹。而秦时“略通

五尺道”,也是出于同样的情况,因而成功地“略通”了五尺道,在西南夷地区“通为郡县”^[4]卷一一七,“颇置吏焉”^[4]卷一一六。这些史例,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尚五观念在古代蜀人和先秦蜀文化中所占有的核心凝聚力地位。

五尺道的命名同样也是出于蜀人数以五为纪的制度。《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记载古蜀“五丁力士”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国家公共工程的修建,而凿山开道、开辟和维修交通路线又是“五丁力士”的最重要义务之一。蜀人数以五为纪,所辟道路亦以五计数,两者之间当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且,由“五丁力士”所开的道路,称为“五尺道”,也是理所当然。由此看来,五尺道始辟于蜀人而非秦人,乃是信而有征的。这也说明,五尺道是古蜀国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

从商周之际古蜀已经形成数以五为纪的制度来看,五尺道的初通应始于商代。其实史籍关于杜宇入蜀的记载,已经为这条交通线路开辟的年代在商代提供了有力证据。史称杜宇为朱提人,朱提为今云南昭通^[5]卷二八,由云南昭通北上,经大关、盐津至四川宜宾,正是五尺道所经由的线路之所在。杜宇为朱提僰人(濮人)^⑤,入蜀自当由僰(今四川宜宾)北上,可见杜宇时期这条道路已经开通。杜宇由云南昭通入蜀,只可能走这条线路,再从今四川宜宾沿岷江河谷北上达于成都平原。杜宇为朱提之濮,杜宇入蜀当是以他为首的整支族群入蜀,否则不可能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社会基础,足以在蜀地推翻古蜀王鱼鳧氏的统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10]卷五三,414,建立起杜宇王朝。由杜宇从朱提入蜀“自立为蜀王”,亦可知朱提当时已经属于蜀的势力范围。至于春秋时期蜀王开明氏“雄张僚、僰”,则应理解为开明王对僚、僰之地的实际控制,僚、僰从此成为蜀之附庸。可见,杜宇氏族从昭通入蜀,表明五尺道至少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开通的事实。据《逸周书·王会篇》所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之词,提到殷畿的正南诸族中有“百濮”,这个殷畿正南的百濮,专贡矮犬,当即云南之濮^[11]卷六。《逸周书·王会》记载西周初周成王举行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王先谦补注:“盖濮人也。”濮或作卜,见于殷卜辞:“丁丑贞,卜又彖,□旧卜。”郭沫若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12]卷二六 西周初年正南之濮进入中原参加周成王的成周之会,其间通道必然是

经由灵关道或五尺道至蜀,再出蜀之金牛道,经褒斜道转至陕南而达中原^⑥。这也意味着,西周初年从四川盆地至云南东北的交通线已经开通。

虽然,“五丁力士”之称见于《华阳国志》是在春秋战国的开明王朝时期,但扬雄《蜀王本纪》并不如此认为,而是说:“天为蜀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蜀山,见于古蜀早期的历史,指岷江上游“蜀山氏”之蜀山,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元妃嫫祖娶于蜀山氏的蜀山,时代相当早,反映出“五丁力士”之制在蜀地的初现,至少在虞夏之际就有其萌芽。不论在《蜀王本纪》还是在《华阳国志》里,“五丁力士”都常与大石相联系,但大石崇拜并非只是开明王朝的特征及文化现象,它早在夏商时代已经存在,三星堆1号坑的一块自然梯形石块,与理县佳山墓葬的现象一致,表明至少在商代,蜀人已形成这一制度及其文化传统。而理县地处“蜀山”之中,它的大石崇拜遗迹正好证明了大石文化与蜀山的关系。这种关系又与《蜀王本纪》关于“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无五丁,辄立大石”的记载恰相吻合^{[10]卷五三,414},绝非偶然。它恰恰表明大石崇拜与“五丁力士”的形成年代是在夏商时代,而不是战国时代。

其实,《华阳国志·蜀志》只是在叙述战国时代的蜀国历史时才提及五丁之制,这并不等于说五丁之制形成于战国。历代史籍对有关史事的记述几乎都是这样,“左史记言,右史记行”,无事则不记。由于战国时代蜀王调遣“五丁力士”从蜀本土出发,远至武都(今甘肃武都)担土,返回成都为蜀王之妃修墓,这一举动成为当时的大事,而“五丁力士”在往返途中,沿途开山修道,又产生了不少怪异的传说^{[1]卷三,190},成为蜀人街谈巷议之资,流传久远,为史官载入史册,当属极自然之事。我们自然不能仅凭史籍对战国事物的叙述而把这些事物统统看作只是在战国才出现的事物。

大石崇拜与五丁制度形成于蚕丛氏之时,还有史可证。《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其地在今四川茂县北境的叠溪。《汉书·地理志》载蜀郡蚕陵县,治今叠溪,旧称蚕陵,即“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13]卷一}。蚕丛氏的来源之地,山崖陡险,怪石嶙峋,由其生存环境而产生大石崇拜,当属自然,这种情况在古代民族中是共通现象。五丁制度与大石相联系,而大石

崇拜产生于夏商时代,那么五丁之制同样也是产生在这个时代。这两种制度(王室的祭祀制度和社会组织的五丁制度)相辅相成,是很有意思的,清楚地表明了王权与其社会基础的关系,王室正是建立并凌驾在五丁这种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一为统治者,一为被统治者。可见,大石崇拜与五丁制度并非神话,它们体现了真实的历史和文化内容。

三 五尺道是蜀通西南夷的重要通道

古蜀与西南夷地区大规模交通的始辟年代至晚也在商代中晚期,其时古蜀王国已向南发展到今四川雅安大渡河流域下游,而古蜀文化圈也已扩张到西南夷广大地区,并在金沙江流域的中游和下游建立了永久性的居住地点^⑦。考古学上,近年相继在四川汉源出土古蜀文化的柳叶形青铜短剑,时代为商周之际^⑧。在汉源富林,1976年出土商代青铜器8件,器物上留有细密的编织物印痕,原应有纺织品包裹,其中有青铜钺3件、青铜戈2件、凿1件、斧2件^[14]。当中的烟荷包式钺和蜀式无胡戈,都是古蜀文化的典型形式,年代在三星堆二、三期之间(商代中晚期),这表明,继三星堆一期以后,三星堆二、三期即三星堆文化也同样在向大渡河流域扩展,而其目的与军事行动有关。

至于蜀与西南夷交通的早期年代,则在夏商之际,即古蜀王蚕丛败亡、南逃西南夷地区的年代^⑨。西汉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载:“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正义引《谱记》说:“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嵩等处。”^{[4]卷一三}唐时姚州治今云南姚安,嵩州治今四川西昌,均为西南夷重地所在。蚕丛国破,年代约当夏商之际,正是三星堆文化兴起之时。蜀王蚕丛后代南下姚、嵩之间,世代在那里活动居息,对于古蜀文化在西南夷地区立稳足根、世代传承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古蜀文化在西南夷地区发生持续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史记·三代世表》既然记载汉代蜀王后世能够常至京师朝降输献,那就说明蜀王后世必为当地邑君,这也正是《史记·三代世表》中褚少孙对所谓黄帝后世“王天下之久远”的举证,表明蜀王后世从夏商到西汉一直在西南夷地区保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而又北与蜀地保持着畅达的交通。

蚕丛氏南迁西南夷地区,绝非孤家寡人,亦非只

有少数随从相从,当是较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只有这样,蚕丛氏后代才可能在西南夷地区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不断发展,也才有可能到西汉时具有往还于中央王朝,“常来朝降,输献于汉”^⑧的能力和资格。

又据《水经·江水注》载:南安(今四川乐山市)“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南安紧邻夔道,是蜀通五尺道的重要据点,不但曾是蜀开明王的治所,还是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同西南夷半农半牧经济进行交流的要冲^[15]。《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开明王“雄张僚、夔”,表明僚、夔之地为蜀国所实际控制,为蜀之附庸^[16]。僚指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至黔西地区;夔指夔道,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昭通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载说:“夔道有故蜀王兵兰”,兵兰指驻兵营寨^[17],应当是古蜀王国建立在夔道的驻兵之所,目的在于蜀军进一步前出南中。考古学上,在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发掘了大批古蜀文明的青铜器^[18-19],贵州威宁出土的古蜀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威宁中水还出土古蜀三星堆文化(3700—3100B.C,商代中晚期)的玉器,均说明古蜀文明在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的传播时代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既有文明的传播,必有传播的通途。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恰好位于五尺道的主干线上。这就意味着,五尺道的开通年代,至少是它的初通年代,一定不会晚于商代晚期,否则对于昭通和威宁地区在那一时代出现古蜀文明因素的现象,就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四 五尺道是古蜀王国的官道

一般以为,五尺道的命名来源于山势陡峭,难以开凿,所以道路仅宽五尺。这种看法源于三国如淳和唐代颜师古之说。《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颇略通五尺道”句下张守节《正义》引如淳曰:“道广五尺。”《汉书·西南夷传》“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句下颜师古注:“其处险阨,故道才广五尺。”其实,且不说以五尺为道完全违反秦法,决不可能为秦法所容许,我们只看汉武帝时遣唐蒙通西南夷道,可以将道路开凿宽至丈余,就可知道颜师古关于“其处险阨,故道才广五尺”的说法之不可信。《史记·平准书》记载:“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唐蒙、司马相如所“开路”的西南夷道,即指五尺道。据《水经·江水

注》记载:“汉武帝感相如(按:指司马相如)之言,使县令(按:夔道县令)南通夔道,费功无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凿痕之迹犹存。”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剑南道上·戎州》亦载:“初,秦军破滇,通五尺道,至汉武帝建元六年,遣唐蒙发巴、蜀卒通西南夷,自夔道抵牂柯,凿石开道,二十(按:十当为千)余里,通西南夷,置夔道县,属犍为郡。”由此可知,五尺道的名称决不可能来源于所谓“其处险阨,故道才广五尺”,即不可能是由于山势陡峭、不易开凿、只能道宽五尺而得名。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五尺道是否道宽五尺,而在于论者将道宽五尺与秦人开凿联系在一起,从而造成了秦人开凿五尺道的错觉。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史书,立即就可知道,不论《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说秦人开凿五尺道,仅仅说秦人“略通”五尺道,而如淳、颜师古等注家在说到五尺道时,也仅仅是说道广五尺,并没有把五尺道与秦人开凿相联系。仅仅因为颜师古在《汉书·西南夷传》“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句下注明道广五尺,论者就以为是秦人开凿了仅宽五尺的五尺道,这显然是误读史书,违背了史书的原意。实际上,从《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来看,倒是在秦人进入西南夷地区以前,五尺道就已经存在,只是因为秦时五尺道曾经破损,而经由秦人整修罢了。

那么,为什么秦人仅将从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之间的交通线路称为五尺道,而从蜀地进入西南夷地区的另一条交通线灵关道却不称为五尺道呢?这与秦人整修五尺道并沿袭其旧称有关。五尺道为蜀国“五丁力士”所开凿,原为蜀王国的官道,属于古蜀王国的国家工程,故以五尺为名,称为五尺道。从史籍可见,战国时秦人从蜀至西南夷地区,分为两路南行,东路沿五尺道,西路沿牂(一作旄)牛道(灵关道),这两条交通线均为蜀时故道。东路的五尺道可由黔西北通往黔中,历来为秦王朝所特别重视,同时为笼络蜀人,利用蜀人维修整治,故沿袭蜀时旧名。而秦沿西路牂牛道南下,其政治军事势力仅达越嵩而止,而且这条道路也没有经过秦人修整,所以其旧名没有为秦人所沿袭下来。五尺道之所以以“五”为称,而不是为秦王朝“一断于法”之下“数以六为纪”的以“六”为称,原因就在于“五尺道”是沿袭古蜀王国的故道和旧称,而不是由秦人新辟和命名。

事实上,先秦时期不论中原诸侯还是西方秦国,他们与巴蜀以南的西南夷地区都没有多少直接联系,先秦文献对于西南夷地区的道路也极少记载,即便五尺道的名称也是由于秦灭蜀以后才见于文献记载,而西南夷道、牦牛道或灵关道等名称,也都是始见于汉代文献的名称,至于先秦古蜀王国时期这几条道路叫什么名称,历史文献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是否亦由“五”命名或与之相关,今已难知其详。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秦人在蜀地南部分东西两路南下进入西南夷地区,一路沿五尺道,在五尺道上“颇置吏焉”,一路沿牦牛道,在邛、笮“通为郡县”,两道的“略通”年代均在秦灭前十余年,远远晚于古蜀通西南夷的时代。而且,秦人所略通的这两道都是沿着旧时古蜀王国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而下,并没有新辟道路,这两

道都在秦灭后就立即恢复了旧日的古蜀关隘,而蜀商要进入西南夷地区必须偷越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灭后,西南夷诸族立即“关蜀故徼”。所以,一当西南夷脱离秦王朝的统治,“蜀故徼”也就立即随之恢复,蜀商必须偷越关隘才能进入西南夷地区进行贸易。《史记·大宛列传》载:“然闻其西(按:指滇、昆明之西)可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这里所说的“蜀贾奸出物者”,与《西南夷列传》所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是一致的,都是指偷越“蜀故徼”南出西南夷地区的蜀人商贾。所谓“蜀故徼”,是指故蜀与西南夷诸族交通贸易的关隘或关卡,古蜀王国曾在此设置关卡收取关税,相当于《孟子》所说中原地区的“关市之征”。这同时也可以说明,先秦五尺道是古蜀王国时期的官道。

注释:

- ① 古代西南夷地区,指今四川宜宾以南和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地区。
- ② 参见:(汉)班固《汉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卷九十五《西南夷传》。(汉)司马迁《史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作“秦时常頰略通五尺道”,常頰或作常頰。
- ③ 对于究竟是“开蜀故徼”还是“关蜀故徼”,历史文献的记载颇不一致。中华书局 1959 年点校本《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作“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中华书局 1962 年点校本《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传》作“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玉海》卷二十四《地理》、卷一七三《汉北边城、外城》,《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通志》卷一九七《四夷传四·西南夷序略》,宋杨侃辑《两汉博闻》卷五《西南夷传》等,均作“关蜀故徼”、“關蜀故徼”或“關蜀故徼”。
- ④ (汉)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惠王更元十四年(公元前 311 年)，“丹、犁臣蜀”，足见古蜀在西南夷地区的影响力之强大,即便在古蜀国灭亡后这种影响力还长期存在。
- ⑤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司马贞《索隐》引韦昭云:“焚属犍为,音蒲北反。”蒲、焚二字,音近相通。参考: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5、256 页。
- ⑥ 褒斜道见诸史乘很早。《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馆鞆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行船漕。”褒斜道是水、陆两条并行的古道。褒斜道在商代即见开通。殷卜辞所见蜀与商王朝交往,蜀文化中所见商文化因素,多由此道南入汉中,再入蜀之本土。武丁期卜辞“伐缶与蜀”,缶即褒,可见褒、蜀有路相通。殷末蜀师北出褒斜伐纣,西周末郑之遗民南奔南郑,春秋初蜀、秦商品的流通,战国时蜀、秦争南郑,蜀有褒、汉之地等等,都说明褒斜道在先秦时长期畅通不衰。故道是北出蜀地、联系关中的另一条重要道路。因此道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水河谷行进,故名。故道在商周之际已经开通。近年在宝鸡发现的大量早期蜀文化遗物,即由故道进入。西周早期在宝鸡的渭水之南建有散国,周初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记有“周道”,王国维考证此周道即是故道(王国维《散氏盘跋》,《观堂集林》卷十八《史林》十,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887 页)。《水经注》卷十九《渭水下》也提到宝鸡附近渭水支流扞水有“周道谷”。可见故道之开通,其年代大概与褒斜道相差不远。
- ⑦⑧ 这是指蜀王蚕丛后世在姚、嵩等地建立的立足点。《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褚少孙补曰:“蜀之先……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嵩等处。”
- ⑧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年在四川汉源发掘,收获甚丰,出土文物中不乏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资料现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⑩ (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褚少孙补曰:“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

参考文献:

- [1]常璩. 华阳国志[M]. 刘琳校注. 成都:巴蜀书社,1984.
- [2]段渝. 四川通史:第一册[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 [3]葛剑雄. 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个问题[C]//四川大学历史系. 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 [4]司马迁. 史记[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班固. 汉书[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刘向(辑录). 战国策:秦策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7]段渝. 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J]. 中国史研究,1999,(1).
- [8]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 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J]. 文物,1999,(1).
- [9]段渝. 先秦巴蜀文化的尚五观念[J]. 四川文物,1999,(5).
- [10]严可均(辑). 全汉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1]章太炎. 太炎文集:续篇[M]. 武汉:武汉印书馆,1938.
- [12]郭沫若. 殷契粹编考释[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37.
- [13]陈登龙(撰). 蜀水考[M]. 陈一津分疏. 成都:巴蜀书社,1985.
- [14]岳润烈. 四川汉源出土商周青铜器[J]. 文物,1983,(11).
- [15]段渝. 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J]. 历史研究,1993,(1).
- [16]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7]徐中舒. 巴蜀文化续论[J]. 四川大学学报,1960,(1).
- [18]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管理所. 贵州威宁县红营盘东周墓地[J]. 考古,2007,(2).
- [19]王涵. 云南昭通营盘古墓群发掘简报[J]. 云南文物,1995,(41).

On the Opening of Wuchidao and Related Issues

DUAN Yu

(Center for Studies of Bashu Cul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Wuchidao is an important traffic path from Sichuan basin to Xinanyi area and an important route from Southwest China to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in ancient times. However, no thorough research or study has ever been made on the opening of Wuchidao. Most scholars agree that Wuchidao was opened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or Qin dynasty, which turns out to be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ng historical literature documents. The careful research of *Shiji* and *Hanshu*, together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of southwest China in recent years, reveals that Wuchidao is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port corridor between the ancient Shu kingdom and Xinanyi in the pre-Qin period. Wuchidao was not opened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or the Qin dynasty but opened by Wuding of the ancient Shu kingdom in the Sha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path from sichuan basin to Xinanyi area; Wuchidao; open time; Wuding; the late Shang dynasty

[责任编辑:凌兴珍]